

明代浙江族谱研究

常建华

(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, 天津 300350)

[摘要]明代浙江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,从“一本万殊”的宇宙观出发,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,欧苏族谱学和家史犹如国史的认知也影响到明代的修谱。明初编纂的族谱比较简单,明中后期族谱内容更加充实,浙江大族较为重视对族人的规训。明代浙江族谱修纂较为流行,浙东山区聚族而居,修谱尤为突出;浙西水乡析居异财,修谱弱于浙东。明代浙江人修谱求真不诬祖、忽先者有之,修谱攀附作伪而牵连附合、填隙补空者亦有之。

[关键词]一本万殊;欧苏谱;方孝孺;浙东

DOI:10.3969/j.issn.1002-1698.2023.05.016

明代是中国族谱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,其中浙江的族谱修纂占有重要地位。学者已对明代浙江族谱学的重要人物、^[1]修谱现象、^[2]宗族治理个案^[3]以及金华、温州等区域的族谱修撰^[4]有所探讨,但是缺乏全面的论述。本文尝试利用明人文集中的谱序等资料,结合现存明代浙江族谱,就明代浙江族谱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,不足之处,尚请方家指正。

一、族谱修纂的思想

明代浙江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,主要有四方面的考量:一是从“一本万殊”的宇宙观出发,主张人性需要知本而修谱;二是强调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;三是受欧苏族谱学的影响;四是家史犹如国史的认知。

(一)“一本万殊”的知本观

北宋张载《西铭》说:“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。”^[5]后被概括为“民胞物与”。程颐认为:“《西铭》理一而分殊。”^[6]即天地间有一个理,而这个理又能在万事万物之中得以体现,即每个事物中存在自己的一个理。

明代诸多士大夫从“一本万殊”的角度思考问题,明初儒者浙江绍兴余姚人赵搢谦(1351—1395)指出:

天下事物之理,皆一本而万殊者也,有大而旷濔,可循而知者;有小而浅近,不可得而知者。如天下之山千支万派,起伏散峙,若不可得而知者。苟求其所自,虽南北西东之异,支派贯达,要必宗于五岳。五岳之大,脉则总于昆仑也。此虽大而旷濔,由万殊而求一本,

作者简介:常建华,历史学博士,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明清史、中国社会史研究。

可循而致也。^[7]

这种“一本而万殊”如天下之山宗于五岳，五岳总于昆仑一般，而祖先之于子孙亦是同理，修族谱则是“万殊而求一本”。

潘希曾(1476—1532)，字仲鲁，金华人，弘治十五年(1502)进士，官至兵部左侍郎。他也以树木之喻宗族，重视“一本而无二”。他说：

嗟乎！世之人孰不爱其身？惟目前之图而不重其本，轻其身者也。抑孰不爱其子孙？规规身后之利而无以维系其心，弃其子孙者也。枝干峥嵘，必植其根，而后千花万叶于焉以荣。天下未有本拔而末茂者，独木乎哉！是故祖父吾本也，兄弟其枝干，子孙其花叶也。吾父之视吾兄弟犹吾于子也；吾祖之视吾从兄弟，犹吾于孙也。自鼻祖至于耳孙，愈远愈分，而气脉所贯，固一本而无二。世之人惟不知本也，是以骨肉之亲至同途人，喜无庆而戚无吊也。平居不相得，而患难不相拯也。贵且陵贱也，贫且恃富也，将其身之不保而欲以及其子孙不可得也。家之有谱所以重本，始而维系乎族属，君子之善爱其身与其子孙，舍是无所用心矣。^[8]

修谱是重本始而维系族属的行为。

绍兴府余姚新河吕氏《家训·睦族》要求：

宗族之广，不能无亲疏长幼尊卑之分，自吾一身视之，则有亲疏，自祖宗而视之，则一体也。有曰：四海为家，万物吾一体，家视四海，体视万物，又安有彼此视宗人哉！惟理一分殊，故服有等杀，而情无亲疏，施有缓急，而恩无差等。幼必敬长，卑必承忠，喜必庆，忧必吊，未有漠然休戚不相关者也。今立祠堂以祀四祖，置祭田以供春秋，无非敦睦以劝孝友之意，子孙永遵，可弗替焉。^[9]

其睦族的指导思想即是“理一分殊”。

(二)谱系之法为先王宗法遗意

元末明初的士大夫多有从宗法论述修谱必要性的。郑真(约1383年前后在世)，字千之，宁波鄞县人，自号荜阳外史。他认为，族谱可以立

宗：“士大夫家敦睦之法，莫重于立宗，立宗莫先于叙谱。谱所以辨昭穆，明长幼，分远近也。……古者九宗五两之法既已废矣，有能叙其得姓之由，自源而流，由枝而叶，以永一家之传，岂非先王遗意哉？”^[10]将修谱作为立宗的措施。

方孝孺是明初著名学者。洪武三十一年(1398)惠帝即位，遵太祖遗训，召方孝孺入京任职翰林院，他继承并光大了其师宋濂有关宗族建设的思想。他认为：

先王之世，井田之法行，百姓知相拯恤，一国犹一族，一里犹一家，况其同姓之人乎？然犹恐其未至也，复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维持其心。是以上下亲睦，风俗和厚，历世长久，六七百年而不坏，岂非治之得其道故耶？

自井田隳废，人各顾其家，家各务其私，至于兄弟且相攘夺，况他人乎？井田王制之大者，吾末如之何，可以稍见先王之遗意者，惟谱系之法可为耳。一乡之中，一姓之人，少者数十家，多者数百家，其富贫贵贱强弱之不同，至相悬也。苟无谱以列之，几何富者之不侵贫、贵者之不凌贱、强者之不暴弱也乎？得其人谨书之于谱，取而阅之，曰：“是虽贱与吾同宗也，是虽贫与吾同祖也，是虽弱亦吾祖之子孙也。”默而思之，盖恍然悲而惕然惧矣。匪惟一乡一姓者为然也，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。岂惟郡邑之一姓者为然？一国之中其始徙必本于一人，人能思之，则虽相去千里，可合为一宗，视之如一家也，奚有争夺哉！

是法也，先王之遗意存焉，而废也久矣！亲亲之道息，而风俗浸衰，一乡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，况郡国乎？郡国之不可知而合者，势远而无征也。势吾亦莫如之何，幸而可谱者，惟同乡者尔。尚古之士间能为之，则又往往循私而失实，或谬制字名加于不可考之世，或旁援贵显之人加诸其谱之首，而弃其所出之祖者众矣。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！^[11]

在方孝孺看来，大宗小宗之法协助井田之法维系“先王之世”，自井田隳废社会失序，惟谱系之法

可见先王之遗意。修谱可改善贫富、贵贱、强弱关系,促进一乡一姓、同邑同郡乃至一国的社会和谐,人之“思其本”可以促进“亲亲之道”,改变风俗。可惜的是,一些修谱者“循私而失实”,有失古意。方孝孺还自称“有志于先王善俗致治之道”,故看到《楼氏宗谱》编纂者“独自十世祖以下书之,凡生仕卒葬之详,苟有闻者无不备载,阙其所不知,而信其所知也”,是“有识而合于古者”,正合其志向。^[12]

(三) 欧苏谱以及宋儒的影响

北宋欧阳修、苏洵的修谱思想以及族谱体例在明代影响很大,很多明人修谱都要参考欧苏谱。如潘希曾说:“宋儒欧阳氏、苏氏慨然有感乎此,乃考古大小宗之意,修立谱法,其见远矣。由宋以迄于今,士夫家多遵用其法。”绍兴府余姚人吕本说:“虽然谱废亦久矣,至欧、苏二公而始重。六一谓谱之传在得其人,老泉谓贤者之不尽传,由谱不立之过。”强调欧阳修、苏洵对于族谱传承的人物的重视。^[13]

修谱者在欧、苏谱之间,也会有所选择。有的对欧谱情有独钟,浙江慈溪人乌斯道指出:“明之卿相家,甲第相望,皆以儒业显,必有谱牒貽厥后……谱牒之存否,实系子孙之存否。子孙之存否,又在乎子孙之贤否也。余方以此为叹,郡之胡公鼎氏效欧阳公家谱法,缉宗谱……余尝宦游庐陵,知欧阳之家不能不替,其子孙不能皆贤,第其声名事业为世所重,其所缉之谱又可法,故传世久而不坠。”^[14]他以胡氏宗族为例,说明修谱对于宗族存续的重要性。胡氏谱就是参考欧谱编辑而成,恰好乌氏游历过欧阳修的家乡,据他的观察,欧阳修的宗族在明代有所衰落,但是名声很大,且其族谱传之久远。

有的族谱依据苏氏谱例。杭州的钱塘柴氏家谱,“直效苏文安公不祖刺史味道,而惟以详其所可详,亲其所可亲者收之。”^[15]淳安许氏“后谱仿苏氏例,于所亲则图系于前,谱列于前称府君行第,尊所自出也。生没娶葬毕书,详所自出也。”^[16]潘希曾有感于苏谱兴孝之说,“苏氏之作

族谱也,尝曰:‘观吾之谱者,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。’……则斯谱之作不徒然矣。”^[17]

浙人修谱的思想,还受到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影响。如潘希曾说:“横渠张氏亦曰:‘宗法既立,于朝廷大有所益。’或问之,曰:‘士大夫各知其祖,忠义岂有不立,朝廷岂无所益。’呜呼!此先儒立谱之深意也。”^[18]张载立谱以维持朝廷统治秩序的想法得到体现。嘉兴海盐人陈廷器重辑族谱,向同邑张宁索序,张宁答曰:“先正云:管摄天下人心,收宗族,厚风化,须是明谱系使人不忘本,立宗法使人自知来处。子能行古之道,余何辞?”^[19]将为族谱作序视作关乎“管摄天下人心,收宗族,厚风化”的崇高行为而乐意从事。

明人在修谱实践中有所创新。台州太平(今温岭)人谢铎为家乡黄氏族谱作序,说黄某人“复取欧苏之法因旧谱而增修焉。曰大宗图,则因其所为宗绪图者而修之;曰小宗图,则因其所谓六世图者而修之;曰谱传,则因其所谓世事录者而修之。而复益以坟墓志,居徙考,婚姻世考,则又欧苏之所未备者也。於乎!其为法亦详矣。”^[20]黄氏族谱内容比欧苏谱要完善。

(四) 修谱犹如修史的认知

王畿(1498—1583),字汝中,号龙溪,绍兴府山阴人,师事王守仁,为王门浙中派创始人;嘉靖十一年(1532)进士,授南京兵部主事,进郎中;后谢病归,来往各地讲学40余年。王畿从春秋大义论述家谱借鉴国史,还引入心学解释修谱。万历五年(1577),他赴宣歙论学,应太平县杜氏之请,为之作序,阐发了他对谱学的看法:

夫有国史有家乘,乘者史之流也。按凡例修国史者必知《春秋》之义,然后可以明王道而正国体,修家乘者亦当知《春秋》之义,然后可以明人伦而正风俗,可谓得其意矣。予谓欲明《春秋》之义,莫先于辨是非,究明一体之学。良知者是非之公,自圣以至于途人,皆所同具,无是非之心非人也。良知者天地之灵气,原与万物同体,手足痿痹,则为不仁,灵气有所不贯也。有人于此以县寓为家,

以昊天为祖,以四海为兄弟,以万物芸芸为同体,谁曰不可,故同之则楚越一家,以其心之同也,异之则肝胆易处,以其心之异也。今夫聚族而居,父子伯叔兄弟咸在,出入则同,吉凶庆吊则同,序,事则同堂,会食则同席,由是而及其所自始,一体相授,俨然如将见之,以其谱之存也。古者敦睦以合族,君子难之。夫合族之难,非合之难也,以身范族之难也。非身范之难也,能以族范身之难也。故勇可以夺三军,而不可以加一族,力可以抗万乘,而不可以藐周亲,顾躬行何如耳。子也,既明一体之义,以身为范,不患出之无本,一人倡之,众皆从而和之,使伯叔兄弟共明一体之学,以其所范,概于子之身一体相承,绳绳不绝,人伦将自此而可明,风俗将自此而可正,合并为公,以实行将之,不徒科条粉饰之具,始足称为善俗耳,予故乐而道之。^[21]

欲认识春秋大义,需要究明一体之学,合族需要有人以身范族,从而一体相承,明人伦而正风俗。

有人在家谱与国史之间加上了方志。如宁波慈溪人郑满认为:“谱之作尚矣!国有史,郡县有志,家有谱一也。”^[22]

二、族谱的内容

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动荡,明初编纂的族谱比较简单。以台州府为例,黄岩的吏部员外郎陶汉生修谱,“列图于前,系谱于后,以明世次,名曰陶阳图谱。”^[23]这个图谱由图与谱构成。童氏有家谱一编,“图以系世,录以著行。”^[24]图和录组成家谱。宁海葛氏“辑其支派分别、名字年寿、卒葬之详为书”。^[25]仙居陈氏在旧谱基础上新纂:

其家旧藏世系图,为三纸,其一纸始自始祖至于六世;其次纸始于六世独列十二解元、十二朝奉、十三解元、十六郎四人,余若干人皆不列,而表为近派;又其次纸始列十二朝奉,次及特进,而表为本派。盖作此图者,特详于其所自出,固无足怪也。但其所谓近派者,于六世七世之间失著支系,是以于世代莫

知所属。故今谱于六世之下,惟十二朝奉特著特进一人,而余皆缺所生不著,所谓信以传信,疑以传疑,盖其慎也。^[26]

这个洪武二十七年(1394)所序的图谱原来只有“三纸”,续修的内容也不会太多。

一些文献被收入族谱。嘉兴府海盐人张宁为同邑陈氏族谱作序,谈到陈氏分为东西两派,“六世派各空其左方,以俟修续。次之以铭志,终之以名儒送赠诗文焉。”^[27]收录了墓志、诗文。

也有内容丰富的族谱。温州瑞安鍾氏族谱有谱例、系图、世谱、家规、家仪、诰敕、碑志七项,“首之谱例,明作谱之法也,次之系图,著承传之序也。又次之世谱,纪行实之详也。亢宗鸠族,必有规范,故家规次之。提身正家,必有仪架,故家仪次之。附以列圣之诰敕,昭天宠也。继以名贤之碑志,表卓行也。其立例严,其考据精,真得古人作谱之良法矣。”^[28]值得注意的是,该谱有谱例,给人以规范的印象,而设有“家规、家仪”表明重视家族规训。又如黄岩谢氏,“旧谱称典农中郎将纘,盖自纘至仆射仙若干世,为一图。自仙子经略使鞅徙居黄岩者,又若干世,为一图。世乱阙逸,多不可考。其后或妄加补缉,遂成完书,虽其子孙亦莫之知也。成化庚寅,温岭郭端朝氏修于翁山之塾,以会稽派远,始削其图,而鞅以下犹因其旧。知宝庆府愚得先生世修尝侍其季父梅坡翁性玉,获闻同异之实。辛卯之岁,乃取旧谱,参用欧苏家法,阙疑去伪,揭鞅为始迁之祖,断自濬为一世,世经而支纬之。既又与其从子太史君鸣治推义广例,为名录,为谱传,为宗范,为居址世考,为祠墓志。又系以累朝诰敕及士大夫所著述者,类为若干卷。篇有序,序有义,可谓无遗法耳矣。”^[29]该谱不断编纂,删去远派,新谱有名录、谱传、宗范、居址世考、祠墓志以及诰敕与文献,而“黄岩之黄氏,自昭武镇都监绪兄弟为三族,惟都监所居洞黄族有谱。至十四世孙松坞处士公尚修之,其子职方主事彦俊又修之。其孙文选郎中世显又增义益例,考其居址、坟墓、婚姻甚备,附以诰敕诗文,征诸大夫士为序跋,合

若干卷”。^[30]也是多次编修,有世系,有文献。可见这些浙江大族重视对族人的规训。

明中后期族谱内容更加充实。杨廉(1452—1525)所作台州《天台卢氏家乘序》,“其谱之为类,有本支图焉,有恩命录焉,有什一纪焉,有先莹志焉,有文献考焉,有祀典焉,有家训集焉,所载可谓详矣。”^[31]内容分为七项。

以上是依据谱序等资料的介绍所知族谱的内容,下面考察存世明代浙江族谱的内容。笔者经眼过四部明代浙江族谱,其中绍兴府、严州府各两部。

绍兴府两部明谱均是余姚的,都修于万历年间。《余姚江南徐氏宗谱》,明徐师道纂修,上海图书馆藏明稿本。该谱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卷,是一部包含两支派的“宗谱”,有序跋、赞引、凡例、诰敕、先祖事迹、瓜瓞图、宗谱传、像赞、传记、诗歌、记文、墓志、族规、家训等,内容丰富。修复族谱,意在加强宗族的凝聚力,维持族内秩序。

《余姚新河吕氏家乘》,国家图书馆藏,12卷附录1卷,现残存卷4—9、12,计7卷。具体内容,卷4、5、6、7分别为世考一、二、三、四,卷8、9分别为《文献一·史传记载》《文献二·诔·墓志铭·行状·传·赞》,卷12为《文献五》,也就意味着卷10—11是《文献》三至四。卷12《文献五》中收录了行第诗、家训、文移。附录则有《大明集礼纂要》,含冠礼、昏礼、丧礼(附本宗五服之图等)、祭礼(附“祠堂图”“正寝陈设序立之图”)。该谱显示出“家乘”的特色,注重收录文献,附录《大明集礼纂要》强调宗族的礼仪建设。

严州府的两部族谱都是遂安县的,也均修于万历年间。明人张邦聘纂修《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》一卷,明万历三十九年(1611)活字印本。^[32]该谱首载明永乐(二篇)、宣德(三篇)、成化、弘治年间时人所撰序言七篇;接着详载张邦重、张世卿同述的《纯峰张氏家训》十七则(内含附录一则);还有张邦重、毛一公、凌大震三人所作的《路口八景诗》二十四首及贺寿诗三首;文末附有张邦聘、凌大震和余学文所撰《跋》三篇。

引人注目的是该谱不载世系图。其《家训》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意识形态,以治家维护社会秩序,忠于国家,显示出家国一体的特色。

洪汝仲等纂修《遂安洪氏家谱》,上海图书馆藏,明抄本。该谱载序、源流、凡例、祖姓、迁徙图、分派图、列传、寿序、宗约、祭仪等。该谱的宗约、祭仪详尽,给人以强烈印象,反映了万历时期士大夫重视宗族建设,维护社会秩序的努力。

上述四部现存明代浙江族谱的名称是宗谱、家乘、家谱,依据本文前面论述所引文献来看,明代浙江宗族谱系之书的名称有族谱、家谱、宗谱、图谱、世谱、家乘,这些名称基本呈现了当时的一般用法。此外还有其他名称,如“世谱”,崇德赵氏据说出自宋太宗之系,修《崇德赵氏世谱》。^[33]有《东嘉王氏世录》,莫如忠称:“东嘉王氏之为家录、世录也,亦犹国史之遗焉。夫曰世录,录其世系者,凡详于记事,则左史法也。曰家录,录其家藏者,凡详于记言,则右史法也。”^[34]此“世录”录其世系,详于记事,以别于录其家藏、详于记言的“家录”。

三、族谱的体例

明代是族谱体例完善的时期,突出表现在族谱体例的扩展,谱例借鉴史、志体例,会通谱、统宗谱的出现,族谱的政治化倾向四个方面。^[35]这里从其他侧面论述明代族谱体例问题。

修纂族谱,有一定的叙述法则,称之为书法,或曰书例。方孝孺重视族谱纂修,自家族谱纂修有十条例:

一序得姓之根源,二记族数之远近,三明爵禄之高卑,四序官阶之大小,五标坟墓之所在,六述妻妾之外氏,七载适女之出处,八彰忠孝之进士,九扬道德之遁逸,十表节义之乡间。^[36]

这个条例就性质而言,比较重视道德规范的彰显。其中记载妻妾之外氏、适女之出处、彰忠孝之进士、扬道德之遁逸、表节义之乡间,带有明显的表彰忠孝节义的成分。

潘希曾所制定的《谱例》有谱图以及传等：

姓氏之所从来远矣，时代变迁，其上世多不可知。吾所可知之世，吾尊以为始祖，可也。谱图界上下旁行，上自高祖，下止玄孙，为五世。玄孙再提为九世，又再提为十三世，以至于无穷。图后略疏名字、事迹为传，各以其世列焉。异姓冒嗣者不得书，同姓而失其宗派者不得通谱。凡嫡长子继始祖者，族人世宗之，所谓大宗也。继祚者，兄弟宗之。继祖者，同堂兄弟宗之。继曾祖者，再从兄弟宗之。继高祖者，三从兄弟宗之。所谓小宗也。大宗百世不迁者也，小宗五世则迁者也。世远族众，其势必分，续图谱者各自其所亲之为玄孙者提焉，以下系其子孙，亦小宗意也。而皆以吾谱冠焉，则大宗可互见也。谱掌于宗子，支子各藏其副，每岁必会族以读之，生子长孙增书之，是为谱之例云。^[37]

图谱五世一提，各支为图，前置大宗图。最后是藏谱、读谱规定。卓发之（1587—1638），字左车，号莲旬，杭州仁和人，其族谱包括谱图、家传、大传、外传、后录。^[38]费宏介绍温州永康《芝英应氏家谱》前为图、传记六卷，附录为墓图、家训、时文凡三卷，称赞该谱记载甚备，义例甚严，“盖图以派分，则宗之大小不至于混而无别；传以齿列，则族之少长不至于紊而无序；墓以图识，则虽祖之迁歿不至于樵牧弗禁，如后山之所虑也。”^[39]台州府《天台童氏族谱》其例有五：“一曰图谱，合族为一图，迄五世又分为宗图，各疏其行业显晦；其次曰内外谱，凡姻戚之家事迹显著者亦附见之；又其次曰事谱，载先世事迹善行可为后世法者；又其次曰文谱，则自唐以来奉敕修谱、表状及先世遗文；又其次曰墓谱，凡先世之丘墓皆具载焉。”^[40]

两部现存明代族谱内含“凡例”，先看严州府淳安县的《遂安洪氏家谱》：

一曰谱义。夫谱者普也，溥博而无遗也，审本源，别支派，叙昭穆，辨同异，明嗣续，芟繁黜伪，传信阙疑，务在明实，使观者知世数，

虽疏而皆本诸祖宗之一体，感动联属，蔼然有仁让之风，此作谱之本意也。若夫冒祖以自诬，饰贗以夸俗，吾则无取焉。

二曰书法。谱体多仿欧苏，以世次为提首，今谱图于父下明列其子，下必本其父，断以一世、六世、十一、十六世，为提首，连续无间，百世可知矣。宗人世次项下，讳行字号生娶卒葬及出身履历，皆例书之，上下旁行分注事实，书世次，书派名，书迁居，盖所以重一本也。其迁居之下，即以始迁之人为一世，总其世次，尤当以分注下见之子，不可以拟一律论也。

三曰传信。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，知而不传不仁也。无善而称之，是诬之也。今之人祖考初无可纪，偶因繁富气势，假托通显，伪为状志表传，附之谱牒，适以诬之，非所以荣之也。若祖考生平实有贤行，当时失于表著者，追而为之，无乖实录。

四曰阙疑。史迁作《史记》，自陶唐以后世守天官，然亦不能致审于洪荒之世，汉太皇上不得其名，则阙之，所谓史阙文也。谱，家史也。有名则书名，而以字行注之。不得其名，则但以行第书之，不得其行，则书失讳，先后并列于上，而下无所承者，则书失续字讳生娶卒葬，远不可稽者，姑阙之，妄有增益，是自欺也。欺世吾弗为之矣。

五曰谨严。夫亲不容于伪，是吾宗者虽贫贱不弃，非吾宗者虽富贵不攀，图所载者，行以叙齿，事以纪实，葬以稽藏，娶以明配，子以著代，女以重婚，均书之也。继妻必书，为嗣亲也。妾子必书，重继体也。若夫子孙自底弗类者不书，以其自绝于祖祚也。女再醮者不书，妇出于其夫，或夫亡者再改适者不书，以其失妇道也。再娶无子者不书，异姓随母者不书，以其非吾宗也。

六曰嗣续。夫无嗣应取本宗昭穆之子为后者，则注名于本生父下，以见所出之同，刊图于所后父下，以明世嗣之义，其异姓来继者

不书,有妻无后者书无传,未冠而卒后书早世,以释老比无后例。

七曰嫁婚。夫婚姻之家族尊者书其地,否则例书氏,所出有显者书其父之名,若有节义德行之实,有关内教,则书名以注小传以彰之,女归有显者,则书其婿之名,再嫁及犯名分者不书。

八曰纪载。谱之后必有附录,先状志、铭表、碑传,次序记、题跋、诗歌,有关谱者,悉皆录之,以见吾祖考之所交游者,皆有道之士也,外此,不得以概入。

九曰宗约。盖宗者吾身之所自出,实国与天下之本也。使无礼以约之,则生齿日繁,卜筑日广,犹惧涣焉而无统纪也。即乃抚接见颁乡约、宗礼,参以家规,而名之曰宗约。上以宣扬圣谕,下以唤醒人心,使成人有德,小子有造,彬彬乎礼义之俗,而无忝于厥祖焉。否则有不醒焉者,必非贤子弟矣,约中叱之、罚之。

十曰宗仪。宗嗣之祭,有岁定于秋冬,秋则孟月望日以荐新,冬则季月二十四日以谢岁,如清明佳节,各以坟墓拜扫,其盥献之礼,详见祠堂节仪。然主祭者必先严己之精神,率卑幼起敬起孝,以昭祖考如在之诚,如有惰慢不恭,及一切失容之事,许约正副议罚,以警其余。^[41]

该凡例10条,包括谱义、书法、传信、阙疑、谨严、嗣续、嫁婚、纪载、宗约、宗仪,从中可见对于修谱十分讲究,具有知本推仁的修谱理念,反对“冒祖以自诬,饰臆以夸俗”,追求实录,反对增益阙文,出于强调贞节与孝道,对于再醮、僧道予以抑制,附录所载文献丰富,宗约与宗仪反映出该族乡约化,选举约正副,使宗族组织化。

再看绍兴府余姚《江南徐氏族谱凡例》,^[42]共计24条,详尽规定了谱例,其依据史书体例以及欧苏谱例,第1条录诰敕,第2条叙世原,第3—11条围绕系谱之图表所定,多依欧谱,第12—16条为书例,第17条为谱中人的名称问题,

第18条是像赞之例,第19条是宗谱所录文献之例,第20条是族人事迹采择规定,第21条是女性事迹的记载问题,第22条为族规家训,第23条是序跋收录规定,第24条是入谱年龄不限的主张。

四、族谱的修纂

明代族谱修纂盛行于南方地区,在浙江也相当流行。族谱修纂依据宗族墓记等文献,世系分合是修谱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,族谱修纂存在着求真与作伪现象,同时重视对族谱的保管。

(一)族谱流行的地区

多有明朝人认为自古以来北方战争多于南方,故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宗族与族谱保留较多。山东人于慎行指出北方经历的战事,并与南方相比较:

自汉魏以后,晋有羌胡之扰,唐有两河藩镇与五季之乱,宋有金元割裂之虞,大江以北无虑二千余年连州跨域,鞠为荆棘戎马之场,一二遗黎,出没兵燹,仳离流散,往往存一线之息,而保其族姓,故虽大国大邑,亦鲜百室之聚,何言谱牒!吴楚闽越之间,被兵则后而缓,即不无散失,易于生聚,故百里之域,必有望族,或不下千万余指,而有贵且贤者出焉,因得摭摭网罗以为谱牒,岂非所谓足则能征者与!^[43]

战事对北方的破坏重于南方,吴楚闽越所在的南方存谱盛于北方。罗洪先也指出,战争是造成谱牒修纂在北方衰落而在南方兴起的原因:

江北古来战争地,滁和以东,五代至国初,尤当兵冲,蹂践抄掠,莫计启辟。夫土无宁宇,人无强宗,转徙靡常,见闻弗逮,厚本敦爱,感无缘生。士人非甚好古,视谱咸若赘余,其势固然也。惟江以南,中原限绝,祸非难首,定自传檄,间入割据,败不旋踵,宋元遗构,僻隐宛存。故谱牒莫盛于江南,而附援亦惟江南为甚。^[44]

南宋元明江南谱牒兴盛。史学家王世贞也说:

五季之中原日寻于干戈,至靖康而悉以委敌,衣冠之士脱锋刃而窜匿于吴越、闽广之间,抱其遗编以诲其子弟,出而当太平之用,故天下之所称贵姓者渐不在北而在南。^[45]

五代以后,北方士大夫移民到吴越、闽广一带,有这些“贵姓者”在,自然修谱也“不在北而在南”。

浙江人陈鹏为徽州休宁金氏族谱作序说:“吾浙久不续谱,惟徽独重之。沿乡接境,款延学士,无论岁月,盖徽多大姓,而源流甚远,故子孙日见蕃蔓,分处于各邑异郡者,非旦夕可考也。不由谱录,孰通信义,如此岂得不萃精于是哉!”^[46]认为徽州多大姓,重视修谱,而浙江不可比拟。徽州休宁人程嘉燧也指出:“自唐衰谱牒沦废,士大夫不讲久矣。今新安、豫章山谷间故家遗俗,其载籍犹有存者,吴越废著,迁徙不常,虽公卿巨室亦往往邈然迷其所自出。”^[47]将江浙人迁徙不常,不知所自出作为谱废的原因。

浙江的修谱其实存在着地区的不平衡。嘉兴秀水人陈懿典论述谱牒时有专门探讨,他说:“夫古宗法诚未易复,有谱牒则宗法可渐复者。今两浙之中,浙以西杭会嘉湖之区,风俗凋敝,鲜世家巨族,为谱牒之倡纵有一二,亦落落如晨星,其析产异居、单子孤姓者比比也,其法在谱牒之未具。浙以东江左王谢之家声犹在,往往聚族为居,赤城古括天姥之区,衣冠淳庞,有先进之风,大都俗推一人以为长,其谱牒已具,特宗法之未尽举耳。斯二者所为风气异也,诚能体大禹之心,遵成周之纪,用司马之法,宗欧苏之旧,浙西则先倡以谱牒而后率以家法,浙东因其既具之谱牒,而令以宗法行之,直易易耳。惟司世教者留意焉。”^[48]认为浙西鲜世家大族,多析产异居,修谱较少;浙东旧族犹在,族长、谱牒已具,建议浙西修谱行家法,浙东以宗法行之。

绍兴会稽人陶望龄也有类似的看法。他说:“浙东诸山郡多大姓故家,柱础碑碣往往有唐宋间物,其人重本难徙,贵族望,谨姻连,家庙鲜伤,系牒明备;其长老率能抗举宗法,以训定其子弟,有先王遗风。而时复有贤者生其间,为讲求废

坠,弥纶不逮,以为之倡,故其俗久而不坏。至渡江而西,通都泽国,冠绅之里或不能名其祢祖以上,父子兄弟宾介而后见,族属弃远,转徙如脱。盖声利之相薄,风会之相靡,每敝于奢丽之乡,而犹幸存于庞固俭朴之地,其势然也。”^[49]陶望龄强调的是基于浙西水乡与浙东山区生态的不同,造成两地族居及修谱情形的相异。

(二)修谱的依据

明人修谱,往往依据前代遗留的各类文献。明初金华义乌人王祎为《龙泉章氏族谱》作序,说道:

《龙泉章氏族谱》四篇,二十一世孙溢之所著,而章氏有谱自溢始。前乎此,非无谱也。盖其族盛于建之浦城,而分于处之龙泉。其居温之永嘉、婺之永康者,亦本于浦城,与龙泉为同祖。四族子孙,硕大繁衍,在故宋时,每间岁或数年辄为会,会则各出谱牒,互考而续书之,曰《庆系图》。则其族各有谱旧矣。龙泉之谱,尤称详备,然皆荐经兵燹,亡軼弗存。溢为是惧,乃因本房小谱及历代坟记之仅存者,复旁搜远采,裒集而次第之,著为是书。本支原派,秩然有序。于是章氏号为东南巨族者,益可考不诬,则其族之有谱,虽谓始于溢可也。^[50]

该谱是学者章溢所著,其族在宋代就有谱牒《庆系图》,可惜因兵燹遗失。章溢修谱依据的是遗存的“本房小谱及历代坟记”。王祎还说金华俞氏修谱也参考了宗族的坟墓资料:“十四世孙庆,惧愈久且益坠,博考精求,画为谱图,并裒汇墓记遗文及他杂述,总为十卷,书成题曰《俞氏家乘》。”^[51]

浙江盛行佛教,佛教文献也成为修谱的参考。仁和人沈谦撰《安隐寺志》十卷,其中有该寺法师之笔,所写传记识大,法系追始,既详且晰。沈谦与法师开玩笑说,安隐寺得您而传,杜氏得您而不传。指法师俗姓杜,因其出家而少了传宗接代之人。法师领悟此语,于是“遍叩宗老耆,征其支流行迹,又稽二氏冥荐之籍,生年卒

日咸备录之，自其祖勤乐公，迄犹子珮玉，为世八，为传一，自正室小妇迄女子为外传三，虽不知所从来，时远不可稽，中衰不可述，法师意在传信，弗敢溢美，实有谨言之意焉。”^[52]法师修成的这部《杜氏族谱》，依据的是宗老乡耆的口述，特别是搜集了佛道“冥荐之籍”，得以备录先人生年卒日。

有的宗族比较幸运，有旧谱可以参考，进行续作。如朱右为浙江绍兴杜氏族谱作序，说：“予始居越之上虞，祁公之十一世孙肃修其世谱，补其缺略，序历官爵谥，旁考国史传志，缮写成帙。自岐国以前，则太子宾客信所修者。信，岐国之长兄也。祁公以下九世，则肃之高曾所遗旧谱也。有元更化以来，世殊事迁，或弗能袭而益之，则肃为之补也。”^[53]该谱既有旧谱，又参考了“国史传志”。

(三)世系分合问题

世系问题，包括始祖或始迁祖以来的世代传承、祖先以来分衍支派的通谱合族等，我们以温州平阳林氏为例，略作考察。据说该族五季时自长溪赤岸来居四溪。宋中叶，自四溪析居岭门。明初岭门之族字敬伯者，持其谱图请苏平仲作序。据敬伯说：“惟我林氏，自周博陵公历十八代而至于今，二千七百余年，其名字世次，皆于此见焉。……今吾世谱顾详于远而难稽者，略于近而易考者，……由唐而上，全而有征，由唐而下，不全而无征故也。吾于其有征者既不敢忽而不录，于其无征者亦不敢旁求曲证，故以旧谱置于前，而断自所可知者，为岭门谱系附于后。盖林氏之在平阳也，皆祖福唐尉。后若干世，徙四溪。又七世，徙岭门。又五世，支为四房，曰文、曰行、曰忠、曰信。其初兄弟也，服虽穷，亲虽尽，而同所自出也。”^[54]该谱包括新谱与旧谱，旧谱为自周至唐的平阳林氏世代，新谱记载宋以后的岭门谱系，传五世分支四房。

(四)修谱的求真与作伪

修谱是尊祖敬宗的大事，许多纂修者求真纪实。明初浙江平阳林氏修谱，作序者苏伯衡说：

“君子重乎谱者，非以夸门地也，所以慎同异，别亲疏也。故无所据而强加之，是谓诬其祖；可据而反遗之，是谓忽其先。诬祖，不孝也；忽其先，亦不孝也。今敬伯之所为不妄援于己远，不轻弃于己疏，真知孝之道哉。”^[55]强调修谱不得诬祖、忽先，否则是不孝。平阳林氏修谱态度谨严。

夏鏊(1455—1537)，台州天台人，字德树，号赤城，成化二十三年(1487)进士。他说：“近时人家立谱，多取名人显宦为宗祖，而以己之宗祖为他人子孙，冒昧可笑，此谱之不时修之故也。吾邑妙山陈氏之谱，尝一再修于元延祐国朝永乐间，嗣兹累累修葺，皆不妄攀附，可以观家风矣。”^[56]探讨修谱攀附的情形。

关于修谱，严州府桐庐县人姚夔认为：“近世士大夫家鲜知讲及于此，间有及者，或牵连附合，如剪桃接柳，气味不相入，或填隙补空，如断港绝潢，脉络不相贯也。”^[57]将牵连附合、填隙补空视为两大谱弊。除了世系、图谱外，作伪还表现在传记方面。《遂安洪氏家谱》所载“凡例”谓：“今之人祖考初无可纪，偶因繁富气势，假托通显，伪为状志表传，附之谱牒，适以诬之，非所以荣之也。”^[58]

江南重视谱牒，但附援名宗问题严重。福建邵武人谢兆申有具体事例为证：“淳安汪氏之谱则有异，溯其身而上至鲁公之族，且七十余世矣，而讳字卒葬历然如日注，则其详也，殆不胜伪，呜呼！伪详则诬，若祖诬则背本矣。”^[59]认为淳安汪氏谱始祖为周朝分封的鲁公，历世七十余代，而名字卒葬像日历一样清晰，属于伪详。

(五)族谱的保存

族谱修好之后，有发放与保存的制度。绍兴余姚陈氏《增辑宗谱凡例》规定：“宗谱梓行，每堂长给予一本收藏之，不得假借损失，及与人抄录，自弃宗乱族，其或有之，宗长痛责摒绝之，别立堂长，所以重源本也。”^[60]该族由堂长收藏宗谱。

遂安洪氏《宗约》要求：“谱牒修完俱朱亲笔纪录。各宜珍藏，置箱封锁，岁时家长检点，毋许损坏疏失，如有任情借看及不肖盗卖者，以不肖

论罪,各房不多给者,正以谨防此弊也,族众子孙,各宜慎之。之。”^[61]族谱不仅置箱封锁、岁时检点,还控制颁给各房的数量,防止盗卖。

五、结 语

明代浙江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,受到宋儒思想的深刻影响,他们从“一本万殊”的宇宙观出发,主张人性需要知本而修谱。他们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。欧苏族谱学和家史犹如国史的认知,都会影响到修谱。

明代浙江族谱的编撰有较大发展,内容渐趋丰富。明初编纂的族谱比较简单,明中后期族谱内容更加充实,浙江大族较为重视对族人的规训。明代的族谱体例完善,现存的淳安县《遂安洪氏家谱》、绍兴府余姚《江南徐氏族谱》的凡例,均是很好的例证。

明代浙江族谱的普及程度虽不及徽州、江西,但仍较其他地区流行。浙江宗族的聚集与修谱具有两浙的差别,浙西鲜世家大族,析产异居普遍,少有修谱;浙东聚族而居,旧族传统尚存,已具谱牒。两浙生态也有所不同,浙西水乡与浙东山区生态,均影响到族居与修谱。

明代浙江修谱往往依据宗族的坟墓资料,佛教文献也成为修谱的参考,还有参考旧谱与“国史传志”的。修谱需要处理世系分合问题。强调修谱不得诬祖、忽先者有之,修谱攀附而牵连附合、填隙补空者亦有之。族谱的保存受到重视,采取了相关的措施。

注释:

[1]盛清沂:《论方孝孺先生之谱学》,《第三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》,台北:国学文献馆,1987年;常建华:《试论宋濂的宗族思想》,《明代族谱研究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。

[2]曾龙生:《明初士人的修谱睦族热潮再探——基于黄灵庚新编〈宋濂全集〉的讨论》,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》第23卷,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2019年;冯志洁:《明代江南望族谱牒中的祖先建构——以嘉兴项氏为例》,《学海》2014年第4期。

[3]常建华:《宗族与风俗: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——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》,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

2008年第4期;常建华:《隐逸与治家:明万历浙江〈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〉探析》,《史林》2020年第4期。

[4]钟耕:《北江盆地——宗族、聚落的形态与发生史研究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1年;曹凌云主编:《明人明事:浙南明代区域文化研究》(人民出版社,2012年)收录一组宗族研究的论文,其中英桥王氏的明代族谱受人关注,对该谱最早的研究有陈学文:《万历〈东嘉英桥王氏族谱〉的初步研究》,《谱牒学研究》第三辑,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2年。

[5][宋]张载:《张载集》,章锡琛点校,北京:中华书局,1978年,第62页。

[6][宋]程颐、程颢:《论书篇》,《二程集》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,北京:中华书局,2004年,下册,第1202-1203页。

[7][明]赵搢谦:《陈氏族谱序》,《赵考古文集》卷一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29册,第666页。

[8][明]潘希曾:《王氏家谱序》,《竹涧集》卷六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66册,第722页。

[9]《家训二十一条》,《余姚新河吕氏家乘》卷一二,国家图书馆藏明吕本辑、明刻本。

[10][明]郑真:《跋番禺范氏宗谱》,《荣阳外史集》卷四十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34册,第238页。

[11][12][明]方孝孺:《楼氏宗谱序》,《逊志斋集》卷一三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35册,第389-390、390页。

[13][明]吕本:《重修海昌徐氏家谱序》,《期斋吕先生集》卷七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99册,第482页上。

[14][明]乌斯道:《题胡公鼎宗谱》,《春草斋集》卷四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32册,第238页。

[15][明]魏驥:《钱塘柴氏家谱序》,《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》卷五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30册,第384页。

[16][明]柯暹:《淳安许氏族谱序》,《东冈集》卷四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30册,第537页。

[17][18][明]潘希曾:《萧氏族谱序》,《竹涧集》卷六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66册,第543页。

[19][明]张宁:《秦溪陈氏宗谱序》,《方洲集》卷一五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47册,第385页。

[20][明]谢铎:《重修洞黄氏族谱序》,《桃溪净稿》卷二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38册,第320页下。

[21][明]王畿:《太平杜氏重修家谱序》,《龙谿先生文集》卷一二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98册,第513页。

[22][明]郑满:《宗谱序》,《勉斋遗稿》卷一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46册,第290页。

[23][明]徐一夔:《陶阳图谱序》,《始丰稿》卷五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29册,第213页下。

[24][明]乌斯道:《题童氏族谱》,《春草斋集》卷四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32册,第238页。

[25][明]方孝孺:《葛氏族谱序》,《逊志斋集》卷一三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35册,第385-386页。

[26][明]王原采:《仙居陈氏世谱序》,《静学文集》不分

卷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35册,第824-825页。

[27][明]张宁:《秦溪陈氏宗谱序》,《方洲集》卷一五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47册,第385-386页。

[28][明]何乔新:《瑞安鍾氏族谱序》,《椒邱文集》卷一二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49册,第200-201页。

[29][明]李东阳:《谢氏宗谱序》,《怀麓堂集》卷二三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50册,第241页。

[30][明]李东阳:《黄氏族谱序》,《怀麓堂集》卷二六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50册,第272页。

[31][明]杨廉:《天台卢氏家乘序》,《杨文恪公文集》卷一八,续修四库全书,集部第1332册,第524-525页。

[32]浙江遂安《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》,明张邦聘纂修、明万历三十九年(1611)活字印本,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: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孤本秘笈丛刊》第十二册,南宁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年。

[33][明]徐一夔:《崇德赵氏世谱序》,《始丰稿》卷八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29册,第260-261页。

[34][明]莫如忠:《东嘉王氏世录总叙》,《崇兰馆集》卷十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104册,第517页下。

[35]常建华:《宗族志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289-300页。

[36][明]方孝孺:《族谱序》,《逊志斋集》卷一三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35册,第391-392页。

[37][明]潘希曾:《谱例》,《竹涧集》卷八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66册,第747页。

[38][明]卓发之:《族谱序》,《澹菴集》卷一一,四库禁毁书丛刊,集部第107册,第499-500页。

[39][明]费宏:《芝英应氏家谱序》,《太保费文宪公摘稿》卷一四,续修四库全书,集部第1331册,第541页。

[40][明]金实:《跋天台童氏族谱》,《觉非斋文集》卷二八,续修四库全书,集部第1327册,第224页。

[41][58][61][明]洪汝仲等纂修:《遂安洪氏家谱》,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。

[42][明]徐师道纂修:《余姚江南徐氏宗谱》卷一,上海图书馆藏明稿本。

[43][明]于慎行:《云山家谱叙》,《谷城山馆文集》卷一二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147册,第437-438页。

[44][明]罗洪先:《〈浚阳胡氏族谱〉序》,《罗洪先集》卷一二,上册,第550页。

[45][明]王世贞:《陈氏族谱序》,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七十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80册,第205页下。

[46][明]陈鹏:《金粟斋族谱序》,《梅樵先生集》卷五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86册,第106页下。

[47][明]程嘉燧:《侯氏世略序》,《松圆偈庵集》卷上,崇禎刻本,续修四库全书,集部第1385册,第755页上。

[48][明]陈懿典:《谱牒》,《陈学士先生初集》卷二四,明万历四十八年曹宪来刻本,四库禁毁书丛刊,集部第79册,第429-430页。

[49][明]陶望龄:《管氏续修家谱序》,《歇庵集》卷三,续修四库全书,集部第1365册,第234页。

[50][明]王祎:《章氏族谱序》,《王忠文集》卷五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26册,第99-100页。

[51][明]王祎:《金华俞氏家乘序》,《王忠文集》卷五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26册,第108-109页。

[52][明]沈谦:《杜氏族谱序》,《东江集钞》卷六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195册,第235页下。

[53][明]朱右:《杜氏族谱序》,《白云稿》卷五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28册,第61-62页。

[54][55][明]苏伯衡:《林氏族谱序》,《苏平仲文集》卷四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228册,第588-589页。

[56][明]夏鍜:《题妙山陈氏族谱》,《夏赤城先生文集》卷一七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45册,第458页上。

[57][明]姚夔:《四明月湖陆氏宗谱序》,《姚文敏集》卷六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34册,第519页。

[59][明]谢兆中:《德清澈溪嵇氏族谱序》,《谢耳伯先生初集》卷五,四库全书存目丛书,集部第190册,第410页下。

[60][明]陈雍纂修:《陈氏增辑宗谱》,嘉靖十九年陈孟庄刻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

[责任编辑:陶婷婷]